

周维强 著

SHANGWEIYUANQUDE

BEIYING

尚未远去的背影

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周维强 著

SHANGWEIYUANQUDE

BEIYING

尚未远去的 背影

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 / 周维强著.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338-6975-5

I. 尚... II. 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012 号

尚未远去的背影

——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

周维强 著

责任编辑 赵露丹
封面设计 曾国兴

责任校对 戴正泉
责任印务 温劲风

-
-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310013)
- **图文制作**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1000 1/16
- **印 张** 13
- **字 数** 350 000
-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8-6975-5
- **定 价** 18.00 元
-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e-mail: zjjy@zjcb.com

网 址: www.zjeph.com

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 ——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1
1921年春天的画卷 ——芥川龙之介写西湖	11
在新的和旧的之间 ——青木正儿说西湖	18
落花水面皆文章 ——西湖风景在陈从周教授的散文里	27
“西泠片羽” ——谢国桢教授记游西湖	37
休休有容 ——马一浮在杭州	45
逝水人生 ——从两部日记看徐志摩在杭州的踪影	55
尚未远去的背影 ——陶行知先生在杭州的教育踪迹	73
大学与人 ——竺可桢先生在杭州的几次演讲	93
今宵听雨兼听风 如在西湖山馆里 ——青年钟敬文在杭州的民俗学活动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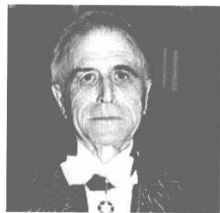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李叔同在西湖的出家	120
“湖上的华时” ——俞平伯与杭州的文化因缘	131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戴望舒抗战片段	146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在杭州	154
平生山林意 ——赵孟頫与美丽杭州的文化因缘	164
“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 ——关汉卿与杭州的文化因缘	174
对一种精致生活的追忆 ——张岱在湖上的往事	182
附录 “旧时月色” ——流在近世文化人散文里的西溪	195
后记	201

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

——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一部十分有趣的书。书的作者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这部书的《导言》里写道：

……我所选定来描绘中国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是被称之为南宋的那个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国都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我所选定的区域则为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作临安，是中国建都之处。……在1275年前后，它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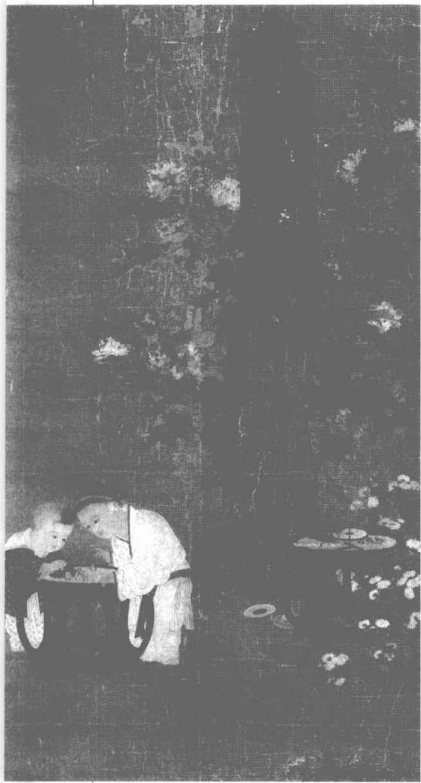


谢和耐像

谢和耐以中文文献——包括宋代以来的笔记小说、地方志等——作为基本的依据，描述了南宋杭州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这部书的章节名称所表明的：“城市”、“社会”、“衣·食·住”、“生命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等。谢和耐借助古代书面材料而勾画了南宋杭州的社会生活——它们的整体景象和细部细节，并作出了一个生活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生长起来的人文学者的思考。

譬如对当时杭州的“教育生活场景”的描摹，就让人饶有兴趣。

在书的第四章“生命周期”的第三节“抚养与教育”中，谢和耐一开头就给出了一个总的概貌：



秋庭戏婴图 [南宋·苏汉臣]

中国的孩子被教养得和气、文雅和恭顺。他们被教导得把自我克制看成最高的品德，同时必须学会乐天知命，并与亲戚、朋友和外人和睦相处。礼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目的，它甚至已经传播到了下层百姓之中。这种礼法反映了某种对人生的理解，并且自有其动人的魅力。这是因为，合乎礼法的彬彬举止并非单纯外在形式，它还伴随着和唤醒着其表达的情感，——在它成为唯一准许的表达情感方式时尤其如此。由此，待人接物的规范就教导孩子们从中兴发出尊长敬贤的感情。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诲：在聆听父母训诫时不得还嘴；在长者（包括父母及其朋友和其他长辈）仍然站立时不得就座；在长辈劝饮时不得推托不喝。在从中亚发现的晚唐时期的文献中，有些教化德行的课本就包括

这类训诫。孝子、挚友和节妇乃是摆在成年人面前的人格理想，那些人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了登峰造极的英雄主义。

这一大段的文字，或许表明了古代中国教育的以德为先的特色，而“德育”的核心内容就是礼，构成礼的主要内容的两翼则是忠和孝。

谢和耐作为一个生长于西方文明中的法国人，很显然地对这样的教育是持保留态度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说：

这种教养的方式窒息了个性，并且倾向于塑造出顺应社会的刻板人格类型。这很难培养出叛逆精神和个人野

心,也不易鼓励出好斗的个性和尚武的精神。

谢和耐又引用了古代的文献,追根溯源:“据记载,体育运动到13世纪已经不大受提倡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身体锻炼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当时的上流社会还对从伊朗传入的马球投以极度的热情。无论如何,在13世纪,只有军队才演练拳击、角力、击剑、马球、射箭和蹴鞠了。宋代时期,在寻常百姓所喜爱的锻炼身体技能的游戏项目和为文人士大夫所喜爱的贵族化的游戏(棋类、书法和文学)之间,恰成一强烈反差。为军事用途而进行技艺训练的情况已很罕见,且不受欢迎。这就导致了应召入伍者大多属于文盲和农民。”

在作出这样的总体的描述和概评之后,谢和耐的笔触就伸向了当时杭州更具体更细微的“教育生活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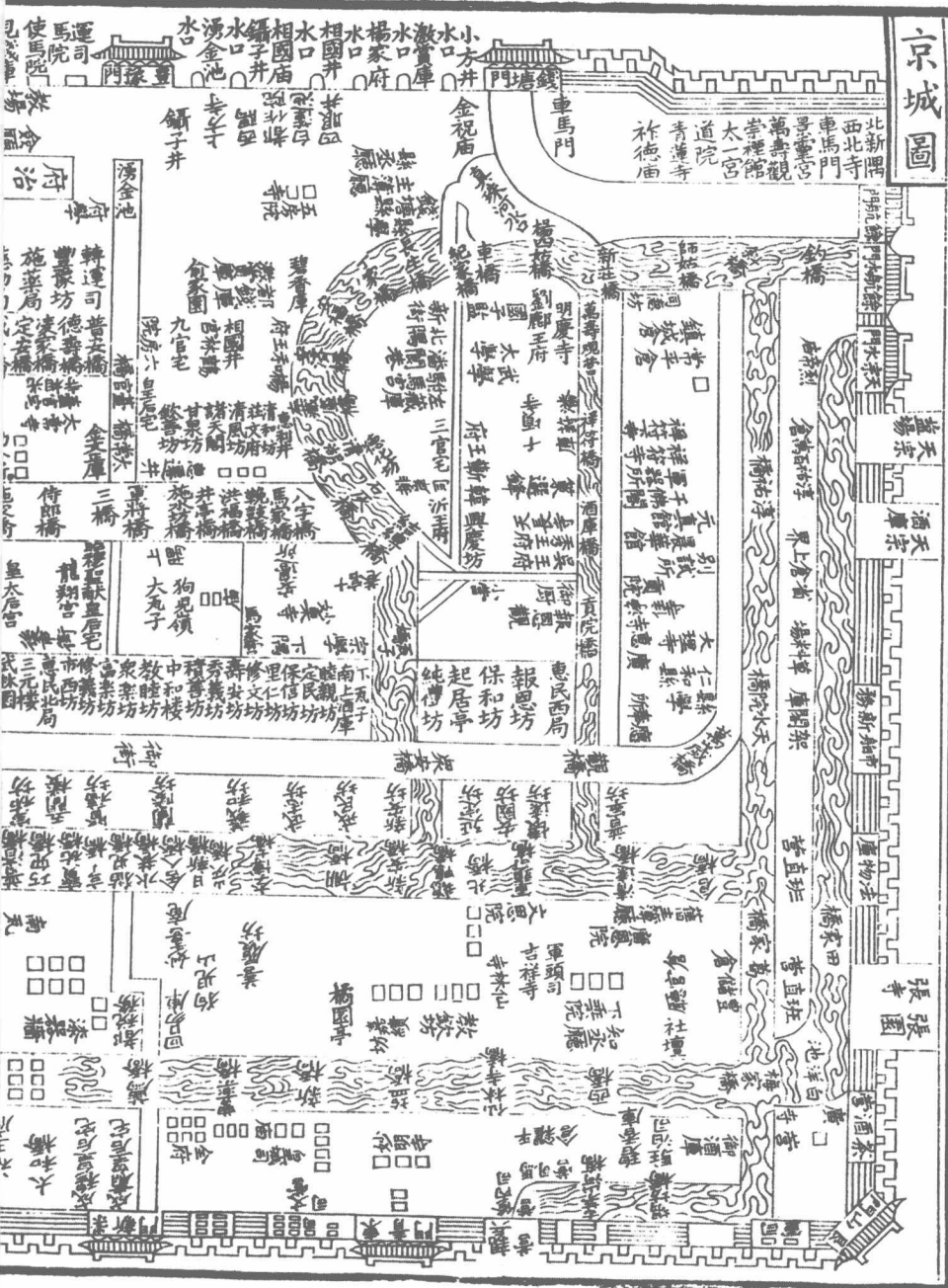
谢和耐从他所见到的中国古代文献里,推断出当时的杭州人“孩提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阶段之一”——“孩子们获准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巷尾尽情嬉戏。他们从不被责打,即使对付实在太淘气的孩子,也只不过是借妖怪之类的东西吓唬他们罢了。”换句话说,严格的礼教,在那个时候的杭州,是还没有施加到孩子们的身上的。他们的童年是充满了快乐和自由的。谢和耐还说:“我们只要看一看走街串巷卖糖果和玩具的小贩为数甚众,便可想见当时的孩子们一定是更经常地受娇惯,而不是受惩戒。”大约到了七岁左右,孩子们会被送入学堂,接受教育。富裕人家则会为孩子延聘家庭教师。

在南宋杭州或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种主流的“基础教育”,可能还是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

城市生活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也许还有印刷术的传播(从公元10世纪起就有两种印刷版本的经书),均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南城镇之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的繁荣。这自然而然地会增加参加官方科举考试的考生数量,而通过这种考试,官僚机构吸收了新的成员,统治阶层也获得了新鲜血液。



京城圖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如果中举人升进士而进入官僚阶层可以带来更多的益处,则科举教育必有深厚的土壤,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也必定繁荣,所以“杭州城内有不少小规模的学校,其教师为致仕官吏或科场失意者,他们靠学生家长缴纳的束脩过活”。这是私学,教师可以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则可知这类私学的广有“市场”。而“政府”也为满足贵族和高官的子弟之外的社会公众的子弟的读书需求,杭州城便兴办了一家府学和两家县学,“均开设在官衙的围墙之内”。

正如谢和耐所说的,“初级教育完成以后,所有的课程均朝着一个方向设计:把学生塑造成适应官方科场的考生”。学生们于是“终日沉浸在这些古代经典之中,变得不仅能谙熟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表达这些思想情感的方式……进一步说,机械式的训练被赋予了极度的重要性;一位优秀的学生须在心中牢牢记住主要的经典著作,并能充分掌握古代和近代诗人的作品,可以仿照他们的风格写诗”。

这样的教育模式里教育出来的学生,通过科举而进入“各级政府”,能够经世致用么?

很多人早就表示过疑问,“有宋一代,许多有识之士对于教育形式的艺术性质深为忧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教育出审美家和业余的文艺爱好者,而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知识——质言之,人们并未为其在行政系统中的预定角色做好准备”。著名的譬如北宋“拗相公”王安石,谢和耐在书里写道: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他曾经创办过州学和县学)曾于1071年上书痛陈当时的开科取士制度的谬误和阙失。他宣称,这种制度之所以得以创立,完全是因为科场提供了晋身官场的唯一正常途径。可是,究竟还有什么能比强迫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关在书斋里以其全部时间和活力去吟诗作赋更荒唐的呢?教育必须为政治哲学和实际行政

能力提供更多的空间。

王安石的批评未始没有道理,但是在南宋的杭州,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总体上恐怕已呈多样化的格局。为科举而准备的“基础教育”依旧是主流,但其他形式的教育也是存在的。正如谢和耐所表述的:“到了12世纪初叶,实际问题无疑已不再像原先那样受到忽视。”譬如——

商业的繁荣,杭州成为大都会,这都使一个人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成为必需。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杭州,谢和耐写道:“也许会有大量孩子受到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他们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因为将来到社会上去谋生或立足,用得着这些。这也表明,在杭州一般老百姓那里,教育有没有用,他们凭着人所具备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是可以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地得出结论的。但他们的认识恐怕也仅止于此,离开活生生的生活的体验和



货郎图 [南宋·李嵩]

实践,就未必能将其认识再往更高一个层次提升了。再进一步说,教育的方式和内容要想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可,其前提必是教育的意义和功效能够为一般公众的生活实践所验证。教育的理想和激情固然可贵,可若不能被公众认可,又如何能够推行开去呢?一般百姓的实用性的价值判断诚然有其“短视”的一面,但这因讲求“实用”而带来的“短视”,是不是多少也能避免“乌托邦”所可能带来的高成本无收益的风险呢?未成年人为今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而预先打一些底子所进行的学习,可以叫作基础教育。所以基础教育也就必须与它所对应的社会相适合。“……大量孩子……被教会粗通文墨,以及如何使用广泛用于计算的算盘。”——我想,这就是立足于南宋杭州

商业文明的有别于为科举作准备的“基础教育”之外的另样的“某种形式的基础教育”吧。

“教育也并非总是纯然文学性和书卷气的。进士科当然是最为人向往的,它考的是韵文和散文,而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并为高中者打开了一条辉煌的仕途。不过,此外还有更专门化和更技术性的考试科目,如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等,不必说还有武学和医学了。”谢和耐讲述道。专科教育不始于宋,唐代就有了。但正如谢和耐所说的,到南宋,实际问题在教育中不再受到忽视。

在谢和耐的这部著作里,我们看到,南宋杭州的教育,在科举教育的主流旁侧,也还并存着其他形式的教育的支流。或者说:谢和耐的著作给我们勾画了南宋时代杭州城里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生动场景。假如有所谓的“南宋遗风”,这个“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传统,不是很有意味的么?

2005年8月29日的《钱江晚报》上刊发了一条标题为“杭州欲为‘南宋遗风’正名”的消息: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的人文精神在精致和谐之外,总是留有“南宋遗风”的影子。多年以来,人们总是将杭州人注重享受、追求安逸的生活态度追究到“南宋遗风”身上,且多持批判态度,而学界对于宋代历史的研究也多只集中于北宋。现在有一批学者准备重修南宋史,50卷本大型南宋史学研究丛书于日前正式启动。

《南宋史研究丛书》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持编纂,邀请了一批国内外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学者,开展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内的研究,立体挖掘“南宋遗风”。该丛书包括了《南宋史研究论文集》2卷、《南宋史专题研究》20卷、《南宋人物研究》10卷、《南宋都城临安研究》

10卷、《南宋史全书》8卷。其中,“南宋史专题”(上、下卷)将在今年年底出版,其余48卷将在6年内陆续出版。

这是杭州近年继《西湖丛书》之后,又一套集政府和学界之力修订的大型文史类丛书,是杭州市又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有关人士表示,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的都城,时间长达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城市建设、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乃至性格、方言等方面,都对后来杭州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南宋遗风”对当今杭州人文精神的形成,究竟有哪些影响,学界未有系统的研究;民间对南宋的影响也多停留在“偏安”文化的负面印象上。重修南宋史,旨在全面挖掘“南宋遗风”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寻找适于当下和谐杭州建设的传统文化遗产。

“南宋遗风”究竟有哪些内容?对今天还有哪些影响?这个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然而研究还没有整体上的展开,标志性的成果也还没有出现,就已经可以“以论带史”地说要“为‘南宋遗风’正名”,就可以框定丛书的卷数和出版的时间,这或许也表明了今日杭州的人文社会科学界里存在着浮夸风和行政化的积弊吧,这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杭儿风”呢?——这是不是也算“南宋遗风”之一呢?

如果谢和耐这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著作里描绘的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场景内容属实的话,或许值得我们作更深入和更开阔的考察。或许这个南宋杭州“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样化”的场景,是可以列为替“南宋遗风”正名的一个题目的吧?

据说写出了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讲过这样的话:要是允许他自由投胎,他最愿意生活的时空区间,当是九世纪(唐代)中国的新疆北部。而写了《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令他最为沉醉的则是七百多年前南宋的临安城,“他有滋有味地细细描绘杭州城的百姓生活,堪称文字的

清明上河图”。(引自刘爽《到哪个朝代活一次》，刊1999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著名汉学家,1921年12月22日生于当时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1942年之前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其学业,获得了古典文学(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和语言学)的学士学位和高等教育文凭。1942年,美军在北非登陆,谢和耐应召入伍参加了抵抗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的正义战争。1945年退伍后,他便将精力转向中国研究。1952年底完成学位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法国是欧洲的汉学重镇。谢和耐则是继马伯乐之后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戴密微(P.Demiéville,1894—1979)的高足。戴密微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写本,他曾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讨过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

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已由刘东译作汉语,江苏人民出版社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5年6月出版。我的这篇短文的引文均采自刘东的这个译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子今曾撰写《“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刊2001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对刘东这部译著的若干译文瑕疵(主要涉及中国古文献的回译问题)作了纠误,可参看。这部译著第62页的脚注,译者误将莫里哀名剧《贵人迷》(又译《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写成《最新贵族的小市民》,则真不知所云了。

2005年10月5日

1921年春天的画卷

——芥川龙之介写西湖

芥川龙之介是现代日本产生世界影响的文学家，有“鬼才”之称。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7月24日，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芥川龙之介的小说，1923年经鲁迅翻译传播进入中国，《罗生门》和《鼻子》是鲁迅最先翻译的，原载由周作人选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芥川龙之介作品进入中国的前两年，芥川龙之介本人就已旅行了中国。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考察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和《长江游记》等散文作品。《江南游记》中有专节写杭州西湖的。



芥川龙之介像

芥川龙之介用他的文学的笔，留下了1921年春天，或者说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西湖的景象。芥川龙之介不是单纯地写生和记录，他还表达了对当时西湖以及西湖人物的感受，读来饶有意味。

这篇《江南游记》的第六节，就写到了俞楼：

俞楼就是俞曲园的别墅。规模的确大方，即使作为正式住宅也不坏。据说因缘于东坡故居遗址而建，伴坡亭后边的竹子和沿阶的草长得十分茂盛。一个长着许多水藻的

古池,使人心情更加闲寂。登上池畔的高处一看,可见曲曲廊的尽头,镶在墙上的石刻。那是彭玉麟为曲园画的梅花图。它就是东京本乡区曙町谷崎润一郎氏故居二楼挂的那张令人拍案叫绝的梅花图原物。按曲曲廊上小轩的匾额来看,这小轩名碧霞西舍。看完它之后,我们再次来到山下伴坡亭。亭的墙上挂满了俞曲园、朱晦庵、何绍基、岳飞等人的各种石刻拓片。拓片太多反倒不能确定喜欢哪个了。墙的正面庄重地挂着镶在镜框里的俞曲园的长髯照片,人物服饰十分得体。这家主人送来一碗茶,我喝着茶端详俞曲园的形貌。……

写到这里,芥川龙之介把笔宕开来,引录章炳麟的《俞先生传》:“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然后芥川龙之介又议论道:

如此说来也多少沾些俗气。也许俞曲园正因为有些俗气,才有给他建造如此别墅的十分出色的弟子们。

芥川龙之介的这个话,也正合中国古语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之意。芥川龙之介说这话的80多年后,柯平在《潜园传奇》(载《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柯平著,东方出

版社2004年8月出版)中,也接着说道:俞曲园虽然“研经讲学,著作等身,素为江南士林所仰重……实际生活中走的好像还是袁子才的路子”。柯平甚至还从俞曲园致陆心源的私人书信里,发现俞曲园有向陆心源“公然”“敲竹杠”的迹象。这或许也可印证芥川龙之介

西泠桥(摄于1921年前)

